清初权力之争中的特殊角色

——汤若望与顺治帝关系研究之一

杨　珍

The col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ng Ruowang and Emperor Shunzhi was conspicuous in the cultural exchange history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during the 17th century. Taking the internal power struggle in the royal cour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Qing Dynasty as a whole, the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political and psychological attitude of Fan Wencheng, a famous statesman who introduced Tang Ruowang to Emperor Shunzhi, and Fan's influence on Tang Ruowang.

明清之际，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个重要阶段，也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最为活跃、传教事业发展相对较快的时期。明末清初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中，德国人汤若望（1591－1666年）作为沙勿略（1506－1552年）等人东方传教策略的杰出实践者，是惟一一位同明清两朝最高统治者有过间接或直接接触，并于清初首先成为新王朝正式官员，随后又深深卷入清廷权力斗争之人。他在清初最高统治集团内部权力之争中的表现与作用，应当说代表了在政治层面上，明清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最高水平。

一

汤若望与顺治帝的密切交往，是十七世纪中叶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十分引人瞩目的一幕。这种关系所产生的基础，根植于多尔衮摄政时期，汤若望对于清廷内部权力角逐双方的态度和立场。

汤若望曾向顺治帝揭发多尔衮一事，已为研究者所论及。不过，尚需将此放在清初皇权发展进程与清廷内部权力斗争的总体背景下，并联系将汤若望引荐给顺治帝的清朝开国名臣范文程的政治心态及其对汤若望的影响，做进一步考察。

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皇太极去世后，经过激烈斗争，清朝最高统治层内各实力集团取得妥协，皇九子福临继位，是为顺治帝。因童年天子只有6龄，由郑亲王济尔哈朗和睿亲王多尔衮辅政，代行皇权。

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作为地方政权的清王朝，开始其建立全国性封建政权的艰难进程。清朝入关后最初7年（顺治元年至七年），是多尔衮摄政时期。由于清朝皇权发展的总体水平，还相对较低，而清廷正在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任务极为艰巨，因此，清朝皇权的集中，是领导统一战争，适应新形势需要的首要前提。已成为“中国实际上之统治者”[①]的多尔衮，充分利用入关后清朝政治、经济等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机，在其摄政期间，通过各种手段，最大限度地将军政大权操于一人之手，这不仅符合清廷切身利益，为巩固统治所必需，客观上也大大削弱了八旗诸王的权势，为其后顺康雍乾诸帝进一步集中皇权，剥夺满洲贵族的权力，打下重要基础。

但另一方面，多尔衮功高震主，“关内关外，咸知有睿王一人”[②]，这势必对顺治帝构成潜在威胁。多尔衮在代行皇权、集中皇权的同时，又在削弱皇权，与皇权正统代表者顺治帝及其母后孝庄太后之间，形成不可调和的矛盾。随着顺治帝年龄的增长，这一围绕清朝最高权力的归属而在暗中展开的角逐，愈加激

烈。直到顺治七年（1650 年）十二月多尔衮以盛年病逝，斗争方行结束。

在此期间，汤若望先是受到多尔衮的器重与厚待，但当多尔衮与顺治帝的权力之争进入关键时刻，汤若望却做出了出人意料的抉择。

顺治元年五月清军进入北京后，多尔衮即强令汉民移出内城，以屯清兵。汤若望缮帖亲赴朝廷呈递，请求仍留原地居住，并对自己所从事的传教与修订历法工作，做了简要介绍。当时担任内三院首席大学士的范文程，从为新王朝广泛网罗人才出发，会见了他，并答应他的请求，地处宣武门内的天主教堂，因此得到保护。[③]

范文程是汤若望结识的第一位清朝官员，这也是汤若望与清廷的第一次接触。范文程对汤若望的良好印象以及对他所从事的修历工作的高度重视，对于后者随即受到清廷重用，起有很大作用。可以说，范文程是明清鼎革之际，首先发现并荐用汤若望的一位伯乐。

不久，摄政王多尔衮召汤若望修订历法，决定自顺治二年（1645 年）起，采用汤若望按照西洋新法所修历书，并将之定名为时宪历。元年十一月，汤若望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正五品)。由西洋人担任该职，这在明清两朝是第一次。

顺治三年（1646 年），汤若望以“创立新法，勤劳懋著”，加太常寺少卿衔（正四品）。[④]由于他“在新朝廷之下，于短时期之内竟也成了一位全国皆知的名人”，外省不少教堂及传教士，皆因与汤若望的关系，不同程度地受到清统治者的保护。[⑤]

多尔衮摄政时期，汤若望在朝中广泛结友，无分满汉畛域。如名列亲王首位，对朝政报以冷漠消极态度的礼亲王代善，曾多次拜访汤若望，向其“述说他的民族以往时代的传说与历史。”[⑥]汉族高官中，曾任吏部尚书，后被指为“南党”党首的陈名夏，以及金之俊、龚鼎孳等，也与汤若望交谊甚厚。[⑦]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仍是大学士范文程。他不仅是首先发现汤若望将其引上清朝仕途的伯乐，而且很可能也是对于汤若望最终作出在顺治帝与多尔衮之间的抉择影响最大之人。

汤若望出任钦天监监正后，部分礼部官员与钦天监官员曾几次掀起反对汤若望的风波。但由于范文程的全力相助[⑧]，而多尔衮在此问题上亦持较为开明态度，才使汤若望安然无恙，渡过难关。

可见，汤若望与范文程之间不是一般关系，后者对他既有荐用之功，又有保护之恩。范文程的政治见解对他深有影响，当是没有疑问的。

范文程是明清之际杰出的政治家，是清朝统治集团中的有识之士。他在努尔哈赤时期被掠为奴，是皇太极逐渐发现他的才干，予以重用，视为肱股。范文程对此感激莫名，对皇太极忠贞不二。顺治帝继位后，具有浓厚封建正统观念，并已改隶镶黄旗的范文程竭诚拥戴幼主，对多尔衮大权独揽，欲谋帝位十分反感，“知睿王叛逆之行，托疾家居，众亦周知。”[⑨]范文程于清朝入关前夕提出以争取汉人人心为要旨的大政方针，与多尔衮入关不久便以征服者姿态所推行的剃发易服等政策截然对立。加之崇德八年（1643 年）十月，即皇太极去世两个月后，多尔衮之弟“多罗豫郡王多铎谋夺大学士范文程之妻”[⑩]，这也影响到范文程与多尔衮的关系。由于政见分歧与个人感情的双重原因，摄政时期曾名列首席大学士的范文程，始终“不附睿亲王”，[⑪]对朝政采取了消极态度。此外，估计范文程已预见到清朝政治局势将发生不利于多尔衮的变化。[⑫]关于他的政治见解及其中缘由，汤若望应是有所了解的。

《汤若望传》一书中明确指出：“第一次引这位传教士觐见皇帝的，便是上面已经提及的那位很和蔼的大学士范大人（即范文程）。”[⑬]汤若望虽为朝廷命官，但仅位备五品，除去常朝之外，很难再有与皇帝接近的机会，更不用说单独接触了。他在明朝崇祯年间从事修历工作长达十余年，并曾入宫为崇祯帝安装天文仪器，多次得到崇祯帝褒奖，可是却从无机会亲眼见到崇祯帝，[⑭]以致深以为憾。所以，范文程的引荐，乃汤若望得以晋见顺治帝的首要前提，而汤若望也因此成为能够直接接触中国皇帝的第一位西方传教士。[⑮]

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引荐发生在何时，并无明文记载。范文程“托疾家居”，很大可能是在顺治五年（1648 年）十一月多尔衮自称皇父摄政王（见下文）之前。如果在这之后他托疾家居，就有反对多尔衮此举之嫌，政治经验丰富，作风稳健的范文程，不会如此而行。因此，范文程将汤若望引荐给顺治帝，大约在

他“托疾家居”，即五年十一月之前。

对于此事，汤若望本人是何态度？只是被动地由范文程带领引见吗？答案是否定的。

以利玛窦（1551－1610年）为突出代表的早期西方传教士，依照沙勿略等人的东方传教策略，并根据中国具体情况所拟定的传教路线与方针，主要是在传教活动中采取一种灵活的适应中国文化（儒家学说）的作法，亦即文化接近与适应策略。同时，“为了长期地定居于中国，必须博得儒生、王公，最后是皇帝本人的友谊”[16]，即通过向统治阶级上层发展，争取最高统治者的支持。“当时传教士们最炽热的志愿，是奉劝皇帝入教，或者使他对于教会发生好感，以便为传教会打开一座广阔的大门。”[17]汤若望忠实地遵循了利玛窦等人所制定的这一传教路线，是文化接近与适应策略以及向统治阶级上层发展方针的杰出实践者。而范文程向顺治帝引荐汤若望，更大可能是应汤若望的反复请求。凭借清统治者对其优礼有加，尤其是他本人与范文程的关系，汤若望不失时机地提出晋见顺治帝的要求，从而终于达到来华传教士数十年来梦寐以求的目的。至于范文程，也因此开辟了一条与顺治帝、孝庄太后进行间接联系的途径。当然，若非对汤若望有关政局的看法与观点已有充分了解，范文程是不会这样做的。

汤若望能够晋见顺治帝，意味着将沙勿略、利玛窦等人的接触策略，又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为其参与政争，提供了先决条件。

促使汤若望在清初权力斗争中的态度发生重大变化的直接原因，是顺治五年（1648年）清廷内部剧烈动荡的政治局势。

顺治五年（1648年）三月，多尔衮为清除其谋取帝位的障碍，蓄意制造事端，打击济尔哈朗、豪格、索尼、鳌拜等人。对汤若望触动最大的，是豪格之死。

肃亲王豪格击败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军，于是年二月自四川回京。多尔衮不予叙功，反罗织罪名将其囚禁，豪格很快死于狱中。豪格对汤若望一向“很有好感”。在张献忠政权中服务并被清军俘获的传教士利类思与安文思，是因豪格与汤若望的朋友关系，方得以保全性命。豪格返京后，汤若望还曾专程赴其府中，为二位传教士求情。[18]足见汤若望与豪格交谊非浅。

值得注意的是，《汤若望传》一书中，对豪格一案有如下记载：“皇帝底皇兄肃亲王豪格，刚自征平暴贼张献忠之战役凯旋而归，深为摄政王之所嫉视，竟致促他至于灭亡。因为他甚至要把他监禁了起来。这位青年的满人因对于此事之愤懑竟致自杀。至于说阿玛王（多尔衮）于肃亲王自杀后，霸占了这一位侄子底妻妾的举动，却是为全国之所愤慨非难的一件事情了。”汤若望对于豪格的同情以及对多尔衮的不满，皆跃然纸上。他在摄政王与顺治帝的权力之争中站在后者一方，从这里已见端倪。

是年十一月，多尔衮“妄自尊大，自称皇父摄政王，凡批票本章，一以皇父摄政王行之。”[20]“摄政时期将近结局”时，多尔衮“竟要图谋国家最高权位，大有自为皇帝的心思了……”。[21]多尔衮这一准备谋取帝位的信号，给予包括汤若望在内的文武朝臣以极大震惊。他最终在多尔衮与顺治帝之间作出抉择，当亦在此时。

顺治帝亲政后不久，在“头几次所开的各王公大臣的会议中，有一次他曾很感激地提及汤若望神父，因为他是使他注意到他的皇叔底专权拔扈，并且曾预言，他的皇叔底早死的。”[22]看来，汤若望于多尔衮与顺治帝之间作出抉择后，随即有所行动，并不止一次向顺治帝揭露多尔衮的图谋行径。

多尔衮摄政后期，当其权势恶性发展，图谋皇位的企图已暴露无遗之际，虽然很多大臣觉察到“多尔衮显有悖逆之心”，“僭妄悖理之处不可枚举”，深为顺治帝的安全担忧，但“俱畏威吞声，不敢出言，是以此等情形未曾入告。”[23]可是，汤若望却坚定地站在顺治帝一边，十分直率地向顺治帝指出多尔衮篡权的图谋，并根据自己的医学常识以及他所了解的多尔衮健康状况[24]，作出多尔衮将不久于人世的判断。汤若望这样做，无疑具有很大风险。顺治帝亲政后，汤若望立即得到孝庄母子的信赖，孝庄甚至表示“将来要以父执敬礼汤若望，并且要作他一切之所命令的。她愿意汤若望以女儿看待她。”[25]这实际上是对汤若望在其母子困难时刻给予支持的一份厚重酬答。顺治八年（1651年），即顺治帝亲政第一年，是孝庄太后与汤若望的关系最好时期，他们在这一年中以各种方式多次交往，《汤若望传》一书

中对此多有记述。[25]

汤若望能够很快与顺治帝建立起非同一般的关系，而且其后数年中又有进一步发展，其中除去汤若望所做的努力，还有顺治帝本人的原因。关于这个问题，将另文论述。

二

清初云谲波诡的政治斗争中，身为外邦远臣的汤若望第一次所扮演的角色，获得很大成功，为他在这一新兴王朝的传教事业，奠定了良好基础。但不久，当他再次参与清朝最高统治层的政争后，他与满洲统治集团部分成员的关系，却开始蒙上阴影，他本人以及他的传教事业，都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

在多尔衮与顺治帝展开权力之争期间，孝庄太后和以她为核心，索尼、鳌拜等人为代表的两黄旗重臣，始终是皇权的竭诚捍卫者，他们为挫败多尔衮图谋帝位企图，保护顺治帝，使之顺利亲政，做出重大贡献。顺治帝亲政之始，又是在孝庄与两黄旗重臣支持配合下，分期分批清除多尔衮党羽，加强巩固了皇权。

清朝入关时，顺治帝只有 7 岁。他是在以汉文化为主文化的客观环境中长大成人，较之其前辈，更易接受汉文化，受到汉文化很深的影响。顺治帝“好华语，慕华制”，主张在“首崇满洲”的前提下，给予汉臣一些权力，以进一步改善满汉关系，扩大统治基础。但孝庄及两黄旗大臣则持不同看法，他们对汉文化怀有抵触情绪，主张仍应遵循关外“淳朴旧制”，极力维护满洲贵族的特权。顺治帝与孝庄分别代表满洲贵族中的开明派与保守派，在治国方针上逐渐产生重大分歧，导致双方的关系日趋紧张。

必须指出，顺治帝在施政中也出现不少偏差，如过分推崇汉文化，忽视满、蒙文化习俗，不能有效团结满洲贵族，轻视满蒙贵族联盟（体现在废黜第一位蒙古皇后、长期不接见蒙古王公等方面）等等。这进一步加重了孝庄等人的忧虑与不满。[27]十八年（1661 年）正月顺治帝去世后，清廷以其名义颁布的遗诏，历数死者生前诸多重大失误，表明孝庄母子之间，亦即两派之间的尖锐对立，已达到水火不容的程度。

政治的本质是权力。顺治帝与孝庄等人的矛盾冲突，开始于政策分歧，最终转化为权力之争，即谋求为贯彻己方政策所必须的最高权力之争。这一斗争不同于多尔衮与顺治帝之间的皇位之争，更为复杂、隐蔽、曲折。

为了进一步推进业已奠定良好基础的传教事业，汤若望再次参与了清廷最高层的权力之争，并在关于达赖（五世）晋京而引起的满汉朝臣争论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早在皇太极时期，清朝就已十分重视西藏与蒙古地区广为传播的喇嘛教。加以清朝统治者实行满蒙贵族联姻政策，不仅皇太极的五宫后妃及顺治帝的两位皇后尽为蒙古贵族女子，包括多尔衮、豪格在内相当一部分满洲亲贵的福晋，亦皆来自蒙古贵族家庭，她们都是虔诚的喇嘛教信徒。顺治朝初年，喇嘛教之所以在北京地区得以传布，高层喇嘛僧徒具有一定权势，此乃重要原因所在。

顺治八年初，汤若望曾“向皇帝上两封奏疏”，其中一封“是弹劾喇嘛教僧徒过于强大的势力的”[28]。他指出皇帝不应对这些人“表示亲信”，更不应相信通过诵经驱邪即能祛除灾病。汤若望明知孝庄太后“是蒙古人，从小信奉喇嘛教，所以对于喇嘛僧徒自来就怀有溺惑心理”，但却无所顾忌，坦率直禀，说明他确信由于自己在多尔衮摄政后期权力之争中的表现，已博得孝庄母子很大好感。当然，这也是汤若望引导顺治帝抵制、摒弃其它文化思想的影响（见下文），从而信奉天主教这一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果然，“皇帝听从汤若望底这些见解，并且将汤若望底奏疏批呈他的母后阅览”。随即而来的，是“喇嘛教庙宇之建筑”，“竟骤然停止，喇嘛僧徒暂时丧失了他们那宰治一切的势力。”孝庄接受汤若望的谏言，并支持顺治帝所采取的相应措施，不惜以损害喇嘛教僧徒的部分利益为代价，以表示对汤若望的信任与感谢，足见她十分看重汤若望在多尔衮摄政后期对其母子的支持，深知这一举措所冒之风险。事实上，孝庄对汤若望的上述谏言，并未真正首肯，她依旧是一虔诚的喇嘛教信徒，患病时仍然是让喇嘛诵经，以求去邪疗疴。[29]

顺治八年八月顺治帝大婚前，汤若望曾借机再次进言，希望皇太后“不要再保护那些僧徒们”。孝庄答应将渐次实行，并说“以后决不容许他们再行干与国家底政事了。”

汤若望所以一再“弹劾喇嘛教僧徒”，并非偶然。利玛窦等人对于儒家学说，采取了适应策略，以利于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但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在中国百姓中颇有影响的佛教(也包括藏传佛教即喇嘛教)，是妨碍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很大障碍，因而视其为异己宗教，采取了毫不遮掩的指责批判态度。汤若望极力弹劾喇嘛教僧徒，甚至达到不计任何后果的程度，与利玛窦等人的做法实无二致。

顺治九年（1652 年）达赖来京觐见顺治帝，是当时清廷的一件大事。

是年八月末，达赖上奏顺治帝，提出或在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或在代噶地方（岱海，呼和浩特市东南凉城附近）觐见。顺治帝当即指出：“太宗皇帝时，尚有喀尔喀一隅未服，以外藩蒙古，惟喇嘛之言是听，因往召达赖喇嘛，其使未至。”“睿王摄政时往请，达赖喇嘛许于辰年（顺治九年）前来。及朕亲政后召之，达赖喇嘛即启行前来，从者三千人。今朕欲亲至边外迎之。”“倘不往迎喇嘛，以我既召之来，又不往迎，必至中途而返，恐喀尔喀亦因之不来归顺。”[30]清朝几次邀请达赖的主要目的，在于解决统一喀尔喀蒙古问题。多尔衮摄政时期，喀尔喀蒙古与清廷的关系相当紧张，顺治帝亲政后，这一情况并未有显著变化。清朝对达赖此行寄予很大希望，顺治帝最初准备亲迎，即反映了这一点。不过，现存有关史料表明，达赖在北京停留两个月期间，清廷并未和他讨论喀尔喀问题。必须说明的是，达赖来朝以及顺治帝是否出边亲迎，是一十分复杂的问题，中外学者已多有论述[31]。本文只是从权力之争的角度，作一分析，其它方面不拟探究。

顺治帝决定亲迎达赖的同时，又令全体朝臣就此事进行讨论。结果，以济尔哈朗、索尼、鳌拜等重臣为首的满臣主张顺治帝亲往迎接，通过“礼敬喇嘛”，以有利于喀尔喀蒙古的归服。汉臣则以“皇上为天下国家之主”为由，反对顺治帝屈尊前往。[32]虽然汉臣的意见旨在维护皇帝的至高无上权威与尊严，符合顺治帝大力集中皇权的意图，但满臣的看法却代表了笃信喇嘛教的孝庄的意见。出于各方面的考虑，也是迫于以孝庄为首的满洲贵族的压力，顺治帝先是同意满臣之议，准备前往“边外代噶地方”相迎。[33]

值得注意的是顺治帝随后采取了两项重要举措。其一，谕礼部严格限制京城地区寺庙喇嘛，“不许越理藩院定数”收徒。[34]这一抑制喇嘛教发展的政策，与达赖即将抵京的氛围实不相合。其二，顺治帝首次“幸太学，释奠先师孔子”。并举行了极为隆重的典礼，亲制文称“圣人之道，如日中天”，勉励师生“讲究服膺，用资治理。”[35]这反映出顺治帝对于喇嘛教与儒教（儒学）的真实态度，是他开始制定崇儒重道治国方针的重要标志，同时也从一个侧面表明，最初往迎达赖的决定并非完全是其本意。

其实，汉官对于喇嘛教在京城的传播，始终是不以为然的。如顺治八年（1651 年）四月，几乎与前述汤若望的有关奏谏同时，内院大学士洪承畴也曾奏谏“将在京喇嘛尽送城外寺中暂住，陆续发回，不复出入禁地”，并停止在“皇城西北”建塔，以免扰民。[36]可见，朝中汉臣已与汤若望达成默契，共同以喇嘛教僧徒权势过重向顺治帝谏言。并非巧合的是，此次汉官反对顺治帝亲往迎接达赖，也得到汤若望及时、有力的回应。

在顺治帝作出亲迎达赖的决定后，“汤若望特上一很长的谏书，并且又亲自向皇帝面奏。他谏皇帝不要自失尊严，招引这一种耻辱。”[37]与此同时，汤若望所主持的钦天监也奏报：“太白星与日争光，流星入紫微宫。”于是大学士洪承畴、陈之遴上奏：“窃思日者，人君之象，太白敢于争明；紫微宫者，人君之位，流星敢于突入；上天垂象，诚宜警惕。”[38]再次谏阻顺治帝出边远迎达赖。顺治帝认为所言甚是，立即表示采纳。同时又派索尼向二人传旨，予以鼓励，并希望以后凡有所奏，仍应直言不讳。于是，顺治帝以不可违背天意为理由，拒绝满臣亦即孝庄等人的意见，没有亲往边地迎接达赖。[39]

顺治九年（1652 年）清廷的这次论争，实质上是此后 8 年（顺治九年至十八年初）满族统治集团内部开明派与保守派展开激烈较量的一次预演。从朝臣开始讨论顺治帝是否亲迎问题，到顺治帝最终采纳汉臣意见这一全过程，反映出以下重要情况。第一，顺治帝亲政以来近两年中，在讨论重大国事时，首次出现以顺治帝、汉臣为一方，孝庄及满臣为另一方的两种截然对立意见，而最终前者获得胜利。

这是顺治帝与孝庄等老一辈满洲贵族之间的分歧首次公开化。第二，双方争辩中，汉臣坚决主张维护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与尊严，即大力集中皇权，满臣则显然忽略了这一至关重要的原则。而满臣的言行，又曲折透露出孝庄及两黄旗重臣不愿顺治帝绝对专权的看法。第三，顺治帝在与孝庄等保守派进行权力之争时，已有部分借重汉臣之力的意图，由此必然触及到满汉关系这一最敏感的问题。第四，在此次争论中，汉文化与西方文化产生了共同点，与满蒙文化形成对立的格局，这是清初各种文化荟萃京师，相互冲撞、交融这一罕见历史现象的集中反映。

汤若望在此次论争中，所以加入到汉臣一方，是为了阻止达赖想让“皇上当他的一位喇嘛弟子”，即信奉喇嘛教这一意图的实现，[40]其维护、发展传播天主教事业的终极目的，不言自明。他以天象示警成功地劝阻顺治帝远迎达赖的同时，客观上也帮助顺治帝在与孝庄等人的斗争中取得首次胜利。汤若望则从此成为孝庄等满洲贵族保守势力的对立面。十余年后，鳌拜等人以他在推算顺治帝第四子荣亲王下葬日期时的失误为由，将其定以重罪，顺治九年事件是一重要原因。

《汤若望传》一书对于顺治九年及其后数年汤若望与顺治帝的密切关系，描述备详，但却再也不曾提及汤若望与孝庄太后的交往。仅仅相隔一年，情况竟如此不同，如果不与上述史实相联系，是很难解释的。康熙年间，传教士南怀仁在致欧洲同道的一封信中明确指出：“太皇太后（孝庄）不喜欢我们。”[41]孝庄从顺治亲政之初优宠汤若望，到康熙年间“不喜欢”西方传教士，这一质的变化，很可能发轫于汤若望在达赖晋京问题上的表现和作用。

汤若望深深卷入顺治帝与孝庄的政见分歧中，这在他与范文程的关系上，也可找到蛛丝马迹。前已述及，汤若望与范文程的关系非同一般。可是，《汤若望传》一书中，却无有关顺治帝亲政后，汤、范二人相往来的只字片语。范文程是否已觉察到汤若望尽管深受顺治帝倚信，但因得罪孝庄等人而隐伏危机，为免遭牵连而有意对他疏远、回避呢？

诚然，汤若望在顺治朝其后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中，也曾站在孝庄一方。如顺治十六年（1659 年）郑成功进军南京，当顺治帝执意亲征，而孝庄及满汉朝臣劝阻无效时，汤若望进宫劝说，终于使顺治帝改变了初衷。又如顺治帝临终时，在皇位继承问题上，汤若望也有力地支持了孝庄关于立玄烨为帝（即康熙帝）的主张。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孝庄对汤若望的不满。因此，康熙初年当汤若望将被鳌拜等置于死地时，孝庄在长久沉默后，最后关头还是予以保护。[42]

三

汤若望先后两次参与清初最高统治层内部的权力斗争，是由主客观多方面因素所促成，但最大的驱动力，是他在中国的传教事业。正如《汤若望传》所指出：“他时时刻刻都明了，他的使命是传教士……他兜揽他的任务，只是因为这任务是与宗教有所裨益的。只是有这一个理由，他才向皇帝贡献这样多的时间”，并接受钦天监监正一职。“他视数理天算的工作为一种传教的手段。”[43]

明清之际动荡不定的局势，为西方传教士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之机，即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尽管大都极为有限）的独特历史空间。事实上，明亡后，中国各地的西方传教士都曾分别为其所在地的统治者效力。除去汤若望供职清廷外，如卜弥格服务于永历王朝，利类思与安文思曾在大西政权中任职，等等。他们对于这些逐鹿中原的政权机构一视同仁，并无任何偏爱，只是以其是否有利于传教事业为准绳，决定自身的行动。不过，因清朝成为中国的统一中央王朝，汤若望的传教业绩则更为突出，为世人所瞩目。更为重要的是，汤若望不仅仅是中国封建政治的旁观者或评论者，而且是直接参与者。其卷入清廷最高层内部政争程度之深，在明清两朝来华传教士中，无人堪比。

由利玛窦所具体化，并在传教实践中行之有效的文化接近与适应策略，主要是将天主教与儒家学说相结合，做所谓合儒、补儒与超儒的工作；其次是通过参加修历等行动，展示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各国取得的科学技术成就，用以吸引中国士大夫，并以此为途径，接触统治上层，为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开辟道路。上文业已述及，除去接近与适应策略外，利玛窦等人对于中国文化也有排斥与反对的一面，这集

中反映在他们对佛教持严厉批驳态度。在此问题上，汤若望表现得尤为突出。

毫无疑问，汤若望成功地执行了文化接近与适应策略。顺治十八年汤若望七十寿辰时，很多儒臣名士纷纷撰文赋诗祝贺，魏裔介称他为“中华之大儒”，龚鼎孳在赠诗中则自称“小儒”，以示敬佩之意。[44]应该说，汤若望在钻研儒学，广泛结交中士方面所取得的出色成就，为他与顺治帝直接接触并倍受信任，打下重要基础。

需要强调的是，汤若望实施文化接近与适应策略过程中，颇具创造性，有超出利玛窦等人之处。事实证明，汤若望在清朝初年的所作所为，他在两次政争中的表现与作用，已达到在华西方传教士所能做到的极限。他通过上述政治行为，为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注入了新的丰富内涵。

清朝最高统治层成员与传教士汤若望之间出现这种独特的互动关系，前者也起有重要作用。

清廷迅速采用西洋历法之举，反映出它作为一个正在迅速封建化的以少数民族统治者为主体的新兴政权，善于接受新事物，“无中国非薄夷狄种族之见”[45]，“对于天算科学怀有极崇高之敬意”，“视这一种科学之代表学者汤若望，为一优越杰出之人物。”[46]这从一个侧面，表现出满族统治者的自信与一定程度的开放性。他们对西方天文历法的认同与接受，具有某些顺应历史潮流发展的合理性特征。

顺治初年，是清朝由地方政权转化为全国性政权的开端，各种制度正在建立，尚不完备，而皇帝、皇太后与摄政王之间、皇帝与皇太后之间围绕最高权力的斗争相继发生。汤若望正是利用这一契机，参与政争，为使清朝最高统治者信奉天主教，为最大限度地有利于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创造条件。

总之，汤若望之所以能够在明清两朝西方传教士中独树一帜，其重要原因，是得力于清初相对宽松的政治、文化氛围，以及由于权力结构尚未定型，缺乏制衡机制而一再引发的清廷最高层政争，但关键所在，还是他本人对于文化接近与适应策略的深刻理解与富有创造性的实践。

当然，这同他的性格特点和处事风格，也颇有关系。

汤若望的性格，是比较外向的。他爽直火烈，活跃好动，“如同一个日耳曼人之所当然的一般，他决不会隐抑他的见解，即便他这见解是人们不乐意听的。”[47]

《汤若望传》对汤若望的性格与处事作风，做了比较客观的评述，在指出他坦白直率，倔强自信，不附权贵，又极富同情心的同时，也无讳其有时过于锋芒外露，较为偏激，易于激怒，特别是步入晚年后愈益固执己见，独断独行的弱点。“这是在传教会人名册中对于他的所加的考语，在较后的时期中易激易怒的成分愈行加重。”[48]这些性格特点，既促使他对少年顺治帝受到多尔衮胁迫的处境产生同情与担忧，也使之一旦做出抉择，便敢于直言，无所顾忌。他如果是一优柔寡断，或谨慎内向之人，很可能瞻前顾后，犹疑不决，即使很有看法，也会采取超然态度，明哲保身了。

汤若望于顺治帝面前对多尔衮的揭发和指责，是他在同范文程及汉族官员、满族贵族的交往中，获取大量信息，并进行分析综合的结果，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这些人的看法和希望。而他以天象示警为由，阻止顺治帝远迎达赖，也是与朝中汉官相互配合，方取得成功。

无庸否认，在明清两朝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中，汤若望是一位比较有政治头脑的人。

明亡之际，包括传教士在内很多人纷纷离京躲避。但无论其传教士同行、中国基督徒及士大夫等如何劝说，汤若望坚持不离开北京，独守地处宣武门内，由利玛窦等人所创建的“南堂”，全力保护教堂及历书刻版，并终于达到这一目的。对此，《汤若望传》一书说在他身上，“不惧怕不畏缩的精神和善察形势的聪明力，互相为表里”[49]，并非谀词。汤若望在多尔衮与顺治帝之间的矛盾斗争日益激化之时，作出站在顺治帝一方的重大抉择；当他敏锐地觉察到顺治帝对喇嘛教的真实看法后，又不失时机配合汉官反对顺治帝远迎达赖之举，借助天象之说，部分达到其排斥佛教的目的，这些都是他具有一定政治头脑，果敢而自信的综合体现。不可否认，这也与他在清廷毕竟处于“客卿”地位，因而能够采取比较冷静、客观的态度，深入观察与分析问题，密切相关。

另一方面，他身为一位外国人，无论如何精通汉语，具备较高汉文化素养，但对于中国封建官僚体制下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

封建王朝政治斗争的复杂性与残酷性，终究缺乏深刻认识。[50]这使他处在政治漩涡之中而较少机心，率直有余而谨慎不足。这一点，不能不说是他在十余年后遭受攻击，身罹大狱[51]的一个主观因素。

还应看到，顺治年间，北京不仅是清朝的政治中心，也是代表不同的价值观，具有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多种民族文化荟萃之地。因满族统治者将其主要精力放在进行统一战争上，对于思想文化领域，暂时还不可能有更多关注。这在客观上为不同民族的文化竞相发展，各树一帜，提供了一个相对适宜的环境。

当时，以儒教（儒学）、禅宗、喇嘛教以及天主教为代表的汉文化、满文化、蒙藏文化以及西方文化，一并集中在京师，而且各以不同方式出现在少年天子顺治帝的身旁。它们都在寻找各种机会极力表现自己，以充分显示其优越性。另一方面，这些不同文化彼此又在激烈冲撞，激烈斗争。其冲撞和斗争集中到一点，就是对顺治帝施加影响，以争取少年天子的认同与采纳，从而在新的王朝赢得立足之地，乃至压倒对方，使其能够成为清朝统治者用以统治中国的思想文化。例如，汉臣竭力引导顺治帝以儒家学说为治国根本，汤若望千方百计促使顺治帝崇奉天主教，达赖则希望收顺治帝为弟子，禅宗高僧木陈忞、茆溪森等人也包围了少年天子，受其影响，顺治帝失意时，竟一度产生剃度为僧之念。足见清朝入关之初，各种文化之间的冲突和斗争，是十分复杂和激烈的。这既是不同民族的文化相互撞击的过程，也是一个彼此相互理解、交融的过程，是在少数民族统治者为主体的的新兴中央统一王朝才会出现的特殊历史景观。

这种情况下，汤若望作为西方文化的代表者，先是于摄政王多尔衮与顺治帝的权力之争中站在后者一方，进而获得顺治帝及孝庄太后的信赖，其后又在顺治帝与孝庄为首的满洲贵族保守派的斗争中，协助顺治帝拒绝远迎达赖，尽管因此而得罪于孝庄太后，但却进一步获得顺治帝的信任，从而为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营造出一个相对有利的环境。在诸多不同民族文化对于顺治帝的争相影响中，汤若望能够捷足先登，取得较大成就，显示出他具有善于观察、迎合并利用顺治帝的政治倾向与心理的独到之处。

然而，中国社会当时所处的发展阶段，汉文化作为本土文化而具有的深厚底蕴与优越性，以及清朝统治中国过程中，必须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即儒家正统思想为指导等一系列原因，决定顺治帝最终还是选择了汉文化。汤若望虽然一时取得很大成功，但很难再迈进一步，达到质的突破，并终于在康熙朝初年四大臣辅政期间遭受挫折。以康熙帝清除鳌拜集团为转折，西方文化在清朝的影响又有所扩大，康熙朝后期起开始削弱，直到鸦片战争后，情况才发生新的变化。

综括而论，明清之际的改朝换代，不仅没有终止西方传教士的传教进程，他们反而借此时机，将它推向更广阔的领域，更高的层次。汤若望所以能够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除去他本人的才干以及所处的有利环境外，还在于他继承利玛窦等人接触与适应中国传统文化，向统治阶级上层发展的传教方针与策略，吸收了他们在了解、研究中国国情方面积累的成果和经验，并在这一基础上，进行了富有创造性的活动。因此，汤若望的这一业绩，是明清之际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事业，亦即中西文化交流进程中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促使这一交流进入一个更高阶段的突破性进展。

汤若望通过他在清初权力之争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开启了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新的一页。

---

①（德）魏特：《汤若望传》，杨丙辰译，第234页，商务印书馆1949年版。

②《清世祖实录》卷90，顺治十二年三月丁酉。

③（德）魏特：《汤若望传》，杨丙辰译，第221－222页。

④黄伯禄：《正教奉褒》。

⑤（德）魏特：《汤若望传》，杨丙辰译，第255－257页。

⑥（德）魏特：《汤若望传》，杨丙辰译，第243－244页。

⑦谈迁：《北游录》，《纪闻》下，《陈名夏》，汤若望：《主制群徵·赠言附》。

⑧（德）魏特：《汤若望传》，杨丙辰译，第241—243页。

⑨《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光明日报出版社1980年版，下册，第177页。

⑩《清世祖实录》卷2，崇德八年十月戊子。

⑪《清史稿》卷232，《列传》19，《范文程》。

⑫参见许曾重：《太后下嫁说新探》，《清史论丛》第8

辑，第 255 页，中华书局 1991 年版。

⑬（德）魏特：《汤若望传》，杨丙辰译，第 267 页。

⑭（德）魏特：《汤若望传》，杨丙辰译，第 155、157、171 一 174、179 页；另参见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华书局 1988 年版，中册，《汤若望》。

⑮按，明代万历时期，利玛窦等人虽然获准居住京城，并多次出入皇宫，为万历帝修理自鸣钟，但“从来没有见过皇帝”。参见林金水：《利玛窦与中国》，第 90－93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⑯（法）伊莎贝尔·席微叶、约翰－路易·席微叶：《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载《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巴蜀书社 1993 年版，第 3 页。

⑰（德）魏特：《汤若望传》，杨丙辰译，第 177 页。

⑱（德）魏特：《汤若望传》，杨丙辰译，第 397、256 页。

⑲（德）魏特：《汤若望传》，杨丙辰译，第 246 页。

⑳《清史稿》卷 218，《列传》5，《多尔衮》。

㉑（德）魏特：《汤若望传》，杨丙辰译，第 246－247 页。

㉒（德）魏特：《汤若望传》，杨丙辰译，第 262 页。

㉓《清世祖实录》卷 53，顺治八年二月己亥。

㉔参见汤若望：《主制群徵》卷之上，五，《以人身向徵》；八，《以地生养向徵》；谈迁《北游录》，《纪闻》上，《汤若望》；《多尔衮摄政日记》，（顺治二年）闰六月十二日；《清世祖实录》卷 24，顺治三年二月乙酉。

㉕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册，《汤若望》；（德）魏特：《汤若望传》，杨丙辰译，第 263－265 页。按，孝庄虽曾十分敬重汤若望，但认一位西方传教士当义父，与其作为清朝皇太后的身份与地位实有不合。沉稳理智且又深谋远虑的孝庄，是不会这样做的。这很可能是《汤若望》一书的译者，将人们对西方传教士的通称“神父（神甫）”一词，误译为“义父”所致。参见王钟翰：《王钟翰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69 页。

㉖（德）魏特：《汤若望传》，杨丙辰译，第 263－266 页。

㉗参见拙著：《康熙皇帝一家》，学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3 页。

㉘（德）魏特：《汤若望传》，杨丙辰译，第 262－263 页。

㉙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朱批奏折，内务府总管巴图等奏，康熙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㉚《清世祖实录》卷 67，顺治九年八月戊辰；卷 68，顺治九年九月壬申。

㉛参见邓锐龄：《关于 1652－1653 年第五世达赖喇嘛晋京的两个问题》，《民族研究》1995 年第 3 期；柳升祺、邓锐龄：《清初第五辈达赖喇嘛进京及受封经过》，载《藏族历史宗教论文选》，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㉜《清世祖实录》卷 68，顺治九年九月壬申。

㉝《清世祖实录》卷 68，顺治九年九月庚辰；卷 69，顺治九年十月庚戌。

㉞《清世祖实录》卷 68，顺治九年九月戊子。

㉟《清世祖实录》卷 68，顺治九年九月辛卯。

㊱《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内院大学士洪承畴奏本》。

㊲（德）魏特：《汤若望传》，杨丙辰译，第 284 页。

㊳《清世祖实录》卷 68，顺治九年九月戊戌；另参见黄一农：《择日之争与〈康熙历狱〉》，（台）《清华学报》，新 21 卷第 2 期。

㊴《清世祖实录》卷 69，顺治九年十月庚戌。

㊵（德）魏特：《汤若望传》，杨丙辰译，第 284 页。

㊶南怀仁：《扈从康熙皇帝巡幸西鞑靼记》，张美华译，载《清史研究通迅》1987 年第 1 期。

㊷黄伯禄：《正教奉褒》。

㊸（德）魏特：《汤若望传》，杨丙辰译，第 383、384 页。

㊹汤若望：《主制群徵·赠言附》。

㊺萧一山：《清代通史》，中华书局 1986 年版，卷上第 1 册，第 679 页。

㊻（德）魏特：《汤若望传》，杨丙辰译，第 243 页。

㊼（德）魏特：《汤若望传》，杨丙辰译，第 381、382 页。

㊽参见（德）魏特：《汤若望传》，杨丙辰译，第 381、382、386、387、416、417 页。

㊾（德）魏特：《汤若望传》，杨丙辰译，第 217 页。

㊿参见（德）魏特：《汤若望传》，杨丙辰译，第 393、394 页。

51参见《清圣祖实录》卷 14，康熙五年三月壬寅；卷 15，康熙五年四月己未。

（作者杨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邮编 100732）